



北京大学教育研究系列

Sojourners and "Foreigners":

*A Study on Chines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United States*

旅居者和“外国人”

——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

陈向明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旅居者和“外国人”

——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责任编辑 韦 禾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
往研究/陈向明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6
ISBN 7-5041-2822-8

I. 旅... II. 陈... III. 留学生—人间交往—研究
—中国 IV. G64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7443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2003339
邮 编	100088	编辑部电话	010-62384600
传 真	010-62013803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389 千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印 数	1—3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前言

本书曾于1998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只印了1000册，很快便脱销了。近年来，我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询问购书渠道。而湖南教育出版社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重印本书，已将版权授予我自行处理。现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本书，使其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对教育科学出版社深表谢意。

除了可以满足上述读者的需要，重新出版本书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有关质的研究的书籍大都集中在理论探讨和方法操作上，完整地反映研究过程和结果的报告比较少。我主编的《在行动中作质的研究》是一本论文集，收集的是较短的研究论文和开题报告。而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报告，描述了一个经过较长研究过程，对参与者进行跨地域追踪，通过访谈、观察和移情分析等手段获得的研究结果。阅读此类报告也许有利于读者了解作质的研究和写质的研究报告的一种方式。

近年来，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韦禾女士一直在致力于质的研究方法的介绍和推广，她策划的“质的研究方法系列图书”也已日益丰满起来。目前，该系列涵盖的内容有：对质的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和操作技巧的系统介绍；开设质的研究方法课程的教案设计和作业样本；学生学作质的研究的体会和反思；质的研究报告举例；质的研究开题报告，等等。重新出版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丰富该“系列”的内容，同时希望鼓励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的案例加入进来。知识的

发展是需要积累的，“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一个一体两面、同时发生的过程。只有通过一个又一个案例的不断积累，我们才有可能丰富并加深对教育这一复杂现象的理解，也才有可能从坚实的实践基础上对质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关涉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

本书最初完成的时间是1994年，距今已有10年之久。虽说自己在作这项研究时确实花了不少力气，但用现在的眼光重读过去稚嫩的作业，总有令我汗颜之处。出版社曾建议我在此次出版时对不满意的地方进行修改，而几次提笔竟无从下手。虽说理解总是此时此地的理解，但它与过去和未来密不可分，时空的绵延无法淹没过去的独特。也有朋友建议说，彼时的写作有彼时的风格，修改后会破坏论文的整体感和即时性。我想，既然本书只是为读者提供一种作质的研究的参考，其解读期待应该是开放的。不同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中吸取不同的东西，作者其实是无法预料的。

带着这样的心理安慰，我着手准备本书的重新出版工作：没有修改本书的基本内容，只是根据需要置换了一些重要术语（如将所有的“定性研究”改为“质的研究”），并对原书中的文字错误进行了纠正。

陈向明

2004年2月20日

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序 一

几乎所有人类的生活经历都经过了人类意义系统的建构和过滤，由人类既存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以后得以表现，并且因此而得到意义上的解释。我们对事物和人的分类方式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而我们自己却很少注意到这一事实。更加令我们难以意识到的是：我们在心理方面的体验〔包括我们对自我（self）、人（person）和个人（individual）等概念的理解〕也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也同样地受制于建立在我们文化基础之上的分类和解释系统。自我和他人，心理和文化，人和环境——在这些两两组合之中，其中任何一方都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其意义均蕴涵在与对方的关系之中。

直到最近这些年，心理学界才开始认真地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对人们自我和他人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各种心理功能模式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发展起来，而且非西方国家的科学家们也在采纳和使用这些模式。但是由于这些模式大都发源于西方，研究的是西方的人群（而且有时候即使是在这些人群内其样本量也非常小），因此其研究结果常常令人产生怀疑。这些模式往往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地域和人群的特征，用于东方时难免产生误差。非西方的心理学家们在使用这些西方的模式时，经常忽略了那些微妙的存在于研究者本人文化之中、反映在当地人民日常生活之中的思维和情感方式。

然而，过去 10 年来，在很多亚洲国家兴起了一股心理学研究热。这些研究主要由当地的学者们发起和主持，他们开始

强烈地认识到文化规范对心理功能的重要作用。陈向明博士的研究便是这一新兴潮流之中的一个优秀典范。当然，这种新的对文化的重视不得不要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即：研究者本人的文化是如何塑造出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和信念的？

毫无疑问，随着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世界政治舞台上不断获得声望和权力，“本土心理学”这一术语也在不断地被得到相应的认可。如果“本土心理学”的发展确实受益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那么，就心理学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而言，“本土心理学”的被认可可以被视为一个最有价值的突破。当我们对人的精神进行研究时，对“生态”（特别是文化生态）加以关注，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件大事。现在陈向明博士的研究对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情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为此我们大家都应该感到庆幸和欣慰。

目前，“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可能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所有场合的理智和情感结构。人类发展的普遍性特点虽然可以用某种抽象的方式来加以确认，但是这些特点却只可能在具体的情境中得以描述和分析。比如说，自我、个人、社会、宇宙、责任和成功这些概念以及它们在人际领域的表现，如友谊、爱、娱乐、工作和家庭等等，当这些概念各自置身于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中时，便具有了不同的意义范围和不同的表现方式。对“什么是‘正确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什么样的成人是社会上认可的合适的成人”这类问题，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具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根源，很难轻易地被人们所抛弃。但是，美国人（或者说任何一个文化群体）都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自己的文化也许只有一套长大成人的标准，而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其他通向成人之道和自我发展之路。

作为一代新型学者中的一员，陈向明博士着重探讨的是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个人的需求和自我意识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个人的意义所在。由于有机会来到美国这一不同的文化氛围里生活和学习，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切地体会到文化对个人以及个人社会情感生活的塑造。而她在中国的童年生活是不可能使她理解到这一点的。然而，由于她同时对自己文化中独特的“自我和他人”的概念具有深刻的理解和关注，这无疑使她能够更好地适应美国的文化。因此，（她也可以更好地在一般意义上分析文化对个人身份（identity）的形成作用）这种分析不仅仅出于她个人

的好恶，而且是用一种严肃的、学术的方式来对文化和个人的关系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

对中国人自我意识的独特性进行探讨和对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自我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对比研究——这两者是很不相同的。将东方人的心理与西方人的心理进行比较有可能使研究者南辕北辙，很容易使他们执意坚持那些他们自己试图想要克服的偏见。把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所有其他本土的心理都必须以这一标准进行比较——这种做法势必会忽略很多应该被纳入一个真正的“本土”心理范畴的东西。如果美国人是个体主义的，那么亚洲人就一定是集体主义的；如果美国人是独立自主的，那么亚洲人就一定是依赖于他们所从属的群体的。这种论调可以如此这般地唱下去。不幸的是，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在亚洲国家的本土心理中存在很多完全不能这样进行比较的因素。例如，最近有一些学者强调西方个体主义和东方集体主义之间的差异。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在中国文化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个体主义及其表现方式。同时，这种“两分法”也不能解释美国人中存在的顺从倾向和“间接表达方式”。我们与其将一个本土心理与别人的心理进行对照，不如使用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使用某一文化中人们自己的语言来评价该本土心理。

陈向明博士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她的研究比较了中国和美国文化中不同场景下人们交朋友的不同方式，但是她的结论却是基于对中国人自己土生土长的对“自我和他人”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她首先对中国人自己对人的潜能、个人以及社会群体等观念的理解进行了调查，然后才对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做出她的结论。因此，这些结论不是来源于某种愿望，即：希望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出于一种需求，即：需要了解那些进入和组成这一独特的、中国式思维的各种因素是什么。

如果陈向明博士只是从文献资料中挖掘出有关中国人的文化信念，这有可能使她遭到某种批评，即：她所找到的“心理”不是一个“活着的”（lived）心理。但是她成功地避免了这样一种批评，因为她除了进行文献检索以外，还从中国研究生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个人的叙述评论中收集了丰富的素材。这些中国学生刚刚踏上美国的国土，他们正在挣扎着试图适应美国社会十分陌生的生活方式。陈向明博士着重调查了这些学生在工作中、课堂上、校园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与美国人交朋友时所作的种种努力。有时候，他们中有的人对交朋友没有作任何努力，这一点恰恰说明在

美国交朋友有多么困难。

陈向明博士的研究不仅仅是为研究而研究，她的研究成果也不仅仅是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知识。事实上，我们可以推断，她对纯粹为了本土心理学的发展而对其进行描述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更感兴趣的是，通过她的笔来揭示中国学生在美国进行跨文化人际交往时所遇到的困难。这些中国学生具有“本土”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因此在美国这个新的环境里他们强烈地感到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希望和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由于她带有这样一种更加实际的关怀，她的研究通过具体的事例向我们表明：指导一个独特心理的基本原则是如何在人们的实践中、在社会行动中以及在活着的经历（lived experience）中得到具体体现的。这是最好的心理“解释”，因为它植根于经验和实际之中，而且突出了“人性”以及一般人际交往中所存在的偶然性因素。陈向明博士将聚光灯投射在中国文化独特的对自我和他人的观念预设之上，揭示了人际关系的成功与否与这些预设之间的相伴随关系。不幸的是，在她的聚光灯下照出来的东西同时也十分令人不安。

中国学生在美国往往希望寻求到他们在中国时所期待的东西，结果他们常常感到非常失望。对于美国人来说，人际关系通常是通过关系中的个人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得以发展和维持的（这也许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而在中国，如果个人表现出某种独立的需要，其人际关系就有可能受挫。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中国同事在进入朋友关系时，期待着他们的美国同事放弃一些自己的独立性；而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在交“朋友”时会显得如此无能。这些误会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令人伤心的，不论是对个人的情绪还是集体中的人际关系都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正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一样，误会和交流障碍是可以被弥补的，但是它们必须首先被理解。因此，陈向明博士在文化的层面探讨文化对交流的作用，这样一种工作是极为可贵的。文化对我们个人身份的塑造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将文化的过滤作用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对它的作用视而不见。“朋友”就是“朋友”，普遍论者会如此争辩说。但是，陈向明博士向我们表明，一个文化中的朋友其行为举止并不完全与另外一个文化中的朋友完全一致。因此，她所做的工作已经同时进入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前沿。

直到最近，文化和情境以某种方式“构筑入”（built into）人的心理习惯这一事实才刚刚得到它所应该得到的认可。陈向明博士就两种十分不同的文化场景中人们所形成的交友习惯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局内人”的视角。此外，她还用自己的研究展示了一套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工具，这套工具可以用来深入探究处于特定情境中的人。用质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心理功能的心理学家目前为数仍旧很少。陈向明博士不仅注意到了细微的心理文化内容，而且对如何了解不同文化中人们真实的思想行为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她在这两方面的建树将她同时放到了两个同样重要的知识前沿：一个与文化心理学有关，另一个涉及到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天天面临着如何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挑战。随着地球上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其他途径而变得日益频繁，很快世界舞台上所有的演员们都必须面对这一挑战。陈向明博士在理解文化差异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为我们进入 21 世纪寻求知识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她进一步摧毁了西方社会科学中种族中心论的偏见，超越了对东西方简单进行比较的倾向。此外，她将心理研究扎根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民俗学（ethnography）探讨之中，将文化研究的语言从讨论伟大长城和经典名著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更加注重人的愿望、需求和价值，更加贴近人文的高度。文化心理学必须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而由于陈向明博士以及其他像她一样的研究者的工作，文化心理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门严谨的学科。

托马斯·萧（Thomas Shaw）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美国 麻省 剑桥

1996 年 11 月 8 日

序 二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陈向明这本书写一篇序文。她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时，我是她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当她完成论文之际，我曾敦促她立即将论文出版，以便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她的研究成果。此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我认为此书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有关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下面，我简单地陈述一下我认为此项研究所作出的主要贡献。

从内容上来说，此项研究描绘了一幅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文化以及与美国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和方式的深刻而又生动的图画。这幅图画植根于中国留学生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意义理解之中，从而使我们切身地体会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感悟、他们与美国人交往时遭到的误会，以及他们在文化适应方面逐步取得的进步。此研究不仅对中国留学生进入另外一个文化所作的努力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中国留学生试图与这另一个文化中的成员进行接触的过程和意义解释进行了感人至深的叙述。研究结果不仅对这一群中国留学生的个人生活经历进行了自传体式的描述，而且揭示了他们在与美国人交往时在经历和看法上存在的异同以及造成这些异同的前因后果。虽然研究结果主要来自中国留学生们自己的视角，但是此书并不只是对他们个人看法的一个简单的陈述，作者对这些看法提供了她自己既具有批评性而同时又富有同情心的分析和讨论。我认为，此研究不仅对那些准备到

美国来学习中国学生将有所裨益，而且对那些将要指导这些学生学习的美国老师们也会有极其有益的参考价值。

从方法上来看，此研究是一个质的研究的杰出范例。目前在美国，质的研究指的是一种以归纳手段为主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着眼于对研究者预先设定的假设进行验证。这种方法力图理解被研究者自己的视角，对具体的时空情境以及这些情境因素对被研究的事情和人物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而不是不顾情境差别做出一个一般性的概括性结论。陈向明的这项研究遵循的便是这种质的研究的路线。她的研究在方法上特别严谨：研究设计十分周密细致，材料的收集既有系统又非常细密，对访谈和观察材料的分析既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又不乏个人洞见，研究结论得到了原始材料的有力检验。

尽管陈向明的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具有以上优点，然而，我认为她的研究方法中有另外四个突出的特点使这一研究具有特殊的、不同寻常的价值。一、她与自己所调查的中国留学生们建立了长期的个人关系，因此她可以深切地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并且有可能在访谈时与他们探讨一些敏感的个人问题；如果她扮演一个远离研究对象的、“客观的”研究者的话，这些敏感性问题的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发掘出来。二、她在分析这些学生的故事时娴熟地运用了自己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使用她自己生活中的感触和想法对访谈材料进行分析和论证；与此同时，她也十分注意不将自己的观点和感觉强加到这些学生身上。三、她成功地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技巧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学生与美国人交往的意义建构勾勒出一幅有机整合的图画。四、在她呈现研究结果和结论时，她把深入的个案讨论与跨个案分析结合起来，既再现了这些学生之间的相同之处又表现了他们的不同之处。

陈向明的研究没有对抽象的理论和技巧进行过分的矫饰和炫耀。确实，这个研究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明了（*deceptively simple*），不但没有宣扬反而掩藏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大量艰苦的工作和深刻的思考。从这一点来说，这个研究可以与质的研究领域内的佼佼者媲美，因为它用一种比较清晰明了的方式再现了所研究的现象，而这么做恰恰显示了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成熟老到。此外，她用两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她从事该研究的过程和方法，这比目前大多数出版的研究报告要详细得多。她这么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她具体从事此项研究的决策过程和具体操作方

式。我认为，这本书不仅会对那些希望了解留美中国学生的人们有所裨益，而且作为一个质的研究的范例，对其他从事研究的人员也有借鉴意义。我希望这本书会得到它所应该享有的广大读者的喜爱。

约瑟夫·A. 马克斯威尔 (Joseph A. Maxwell)

美国麻省牛顿市教育发展中心

高级研究员

1996 年 11 月

序 三

陈向明博士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与美国人交朋友的过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本文是专门为那些对她所使用研究方法感兴趣的读者而写的。由于质的研究可能在中国尚不被人所熟知，而陈向明博士的研究在这方面堪称一个突出的典范，因此我想在此着重对她所使用的方法进行评价。在她所使用的各种方法之中，我将抽取三种分析方法进行重点评价，因为我认为这三种方法对其他类型的质的研究都具有极其有用的参考价值。

首先，陈向明博士综合使用了她称之为“类别分析”（categorization）和“情境分析”（contextualization）这两种方式。在本论文中，她将中国留学生们跨文化交友经历所涉及的主题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分类，这种方法被称为“类别分析”。用这种方法对访谈和观察的结果进行分类可以使研究者以及本书的读者们看到被研究者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中存在的共同之处和规律所在。

这种对多个个案进行综合分类的方法虽然很有价值，但是同时也有可能失去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包括每一位留学生生活经历中不断演化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个人不断变化的思考和反思。要理解和再现这一切，需要使用一种叙述的，即“情境式”的分析方法。陈向明博士在研究结果开头的第一章里对一位中国留学生焦林的个案分析便使用了这种方法。这个个案成功地保存了焦林的经历中情境化、时序性和发展性这些特点以

及焦林本人对自己经历的反思和审视。此外，陈向明博士在类别分析的大框架下采用了许多小型的个案和叙述片段，这些材料为各个类别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衬托和流动过程。

正如陈向明博士所做的那样，将“类别分析”和“情境分析”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有很多长处，比仅仅使用其中一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和充实的画面。我以为，她所感到的存在于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紧张状况（tension）是不可能被消除或解决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两副不同的观察事物的凸光镜。其一不可能被简约为其二，它们也不可能被综合成其三。在陈向明博士的这个质的研究项目中，这两种方法真正做到了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陈向明博士所使用的方法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涉及到她对原始材料进行分类时选择类别的来源。起初，她试图从前人有关中美文化的研究中抽取一些类别，用这些类别来对自己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分析。结果，她发现这么做很不理想，这些类别不能“捕捉到中国留学生们自己对其生活经历的思考方式”。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学生们“自己的思考方式”，陈向明博士及时地舍弃了自己事先设定的理论框架，而是去领会这些学生们所说的话语背后隐含的意思。通过采取一种更加“贴近对方经验”（*experientenear*）的态度反复阅读访谈记录和观察笔记，她找到了更具有文化“本位”意义的分析概念。由于这些概念对本研究的效度更具有意义，可以增加研究的可靠性，她最后决定用它们来对研究结果进行分类。

“主位”以及其对立面“客位”这两个词语起源于语言学研究。“客位”（*etic*）这个词语来自“语音学”（*phonetic*）的后缀，指的是一套带有普遍意义的分析类别，如国际音标，其目的是为了记录下世界上人类所使用的所有语言中的语音特征。相比之下，“主位”（*emic*）这个词语来自“音位学”（*phonemic*），指的是某一语言中具体的、独一无二的语音系统。这种对比可以在人类对颜色的描述这一研究领域中找到类似的例子。“客位”的色谱可以通过不同的波长来显示世界上所有的颜色，而“主位”的颜色词语指的是那些被某一文化中的人们普遍使用、在该语言中具有较高使用频度的那些词语。“客位”和“主位”这一对词语目前已经超出了语言研究的范畴，用于分析和理解文化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

除了灵活交替使用“类别分析”和“情境分析”这两种方法以及用文化“主位”概念代替文化“客位”类别，我想在此强调的陈向明博士所使

用的第三个研究方法是她自己十分贴切地称之为“研究者作为研究工具”这一特点。她在用“贴近对方经验”的态度了解中国留学生们对自己生活经历的“主位”解释时，充分利用了她自己与他们相类似的经验和感受。在对这些学生进行调查的时候，她自己搬迁到美国已有几年的时间，而且她自己在美国这一异文化中试图和美国人交朋友时曾经体验过与这些学生同样的迷惑和彷徨。因此，她将自己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用自己对他们的感受所产生的共鸣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依据。

从正面效应来看，如果陈向明博士在访谈时向她的被访者们认可自己与他们具有同样的经历，他们会减少对自己面子上的顾虑，更加愿意暴露自己的脆弱之处，甚至希望向她倾诉自己内心的酸楚和屈辱。同时，他们也会对她更有信心，相信她能够理解他们欲言又止的心情以及他们的言外之意。而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共同之处进行利用，这么做不是没有其负面效应。由于被研究者的故事对研究者个人来说是如此的熟悉，研究者有可能对这些故事的分析价值失去敏感性。此外，研究者有可能将自己个人在美国生活时所构造出来的“主位”观念强加到被研究者身上。在本书的方法篇中，陈向明博士详细地讨论了她是如何采取措施，力图避免这些因素有可能对她的研究效度造成威胁的。

正是由于陈向明博士在研究方法上所具有的上述以及其他尚未提到的特点，她向她的读者们展示了有可能对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深入研究的有效方式。她本人的研究在这个方面便是一个杰出的范例。

阔特妮·卡兹丹 (Courtney Cazden)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

美国 麻省 波士顿

1996年11月25日

自序

婆罗门人类学家兹尔尼瓦斯说，人类学家要获得三次诞生：第一次诞生于“本族文化之中，受其文化熏陶塑造”；第二次诞生于“所研究的异族文化之中，因为这时他必须生活于异族，学习异族文化，学会像他们那样思维，变陌生为熟悉”；而当人类学家回到自己的故土，就必须经历第三次诞生，将一度熟悉但已陌生了的事物再次变为熟悉（冯增俊，1991：52—53）。我从中国到美国从事学习和研究，然后又回到中国工作，其间就经历了这样三次“诞生”。我生长在中国南方一座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古城，从小就受到中国文化传统、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家庭和学校的影响。回想起来，我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女孩。后来虽然来到首都北京求学和工作，耳濡目染的仍旧是中国的东西。1988年，我到美国波士顿学习，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了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在与美国同学和老师相知及相交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在中国成长的经历，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有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和认识。1995年，我回到中国工作。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我发现很多我认为已经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东西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比如，对“朋友”这一概念，我以为中国人是有极其严格的定义和运用范围的，我在美国对中国留学生这方面的调查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次回国我惊讶地发现“朋友”这个名词已经变成了一个泛指，似乎成了80年